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研究成果

生态翻译学

建构与诠释

Eco-Translatology

Construction & Interpretation

胡庚申 著

HU Gengshen



创于1897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生态翻译学

建构与诠释

Eco-Translatology
Construction & Interpretation

胡庚申 著

HU Gengshen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3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生态翻译学:建构与诠释/胡庚申著.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

ISBN 978-7-100-10264-3

I. ①生… II. ①胡… III. ①翻译学—研究
IV. ①H05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01785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生态翻译学——建构与诠释

胡庚申 著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

ISBN 978-7-100-10264-3

2013年10月第1版 开本 850×1168 1/32

2013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17 1/2

定价: 43.00元

生态范式 方兴未艾

——胡庚申教授新著《构与释》序¹

方梦之

胡庚申教授与我有一段相似的从业经历：早年都曾在科研院所当翻译。多年浸润在科学研究的气氛中，翻译实践经验寸积尺累，科技新知日有所进，科学思维潜移默化，科研方法耳濡目染，创新思变涌动于心，这些都受益终身。

1986年我参与筹备的《上海科技翻译》（现为《上海翻译》）创刊。当年第3期，胡教授即有《科技口译中的“简译”》一文见刊。此后二三年内胡教授又分别以口译中的“补译”、“省译”、“变译”等为内容在《上海科技翻译》上发表系列文章。同一时期，胡教授还在《中国翻译》、特别是在国际翻译期刊 *Babel* 上连续发表口译文章。80年代中后期，国内翻译研究已有起色，不过，评点式、感悟式的文章不少，也不乏空疏的经验介绍，而像胡教授那样专题的、系统的研究不多，尤其是口译

1 《构与释》是《生态翻译学——建构与诠释》一书的简称。本序作者方梦之先生是上海大学资深教授，中国翻译界资深翻译家，中国外语类核心期刊《上海翻译》资深主编（1986-），《生态翻译学》顾问，曾任上海市科技翻译学会会长。

研究。胡教授 80 年代结合工作实际所作的科技口译、学术口译、外事口译等系列探讨，为他此后的跨文化国际交流语用研究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20 世纪下半叶，翻译研究范围扩大，研究对象多元，理论背景宏阔，国外研究途径频繁转向：由语言学途径转至多学科途径，由多学科途径转向文化途径，又由文化途径转到后语言学途径，我国译论界随着国际的风向标转动。你方唱罢我登场。西方学者在译论建构的舞台上统治半个多世纪之后，到了世纪之交，开始沉寂下来。正当人们议论“下一个转向”的时候，“生态翻译学”以全新的姿态登上国际译坛。2001 年 10 月，胡教授在香港浸会大学做了题为“从达尔文的适应与选择原理到翻译学研究”（*From the Darwinian Principle of Adaptation and Selection to Translation Studies*）的翻译讲座。同年 12 月，他登上国际译联第三届亚洲翻译家论坛，宣读论文“翻译适应选择论初探”，发出我国学者自主创导的生态翻译学的声音。此可谓：生态翻译学与新世纪齐步。

随着翻译适应选择论宏观视野的拓展，胡教授于 2006 年 8 月在“翻译文化国际会议”上宣读了题为“生态翻译学诠释”（*Understanding Eco-Translatology*）的研究论文。生态翻译学是在翻译适应选择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以翻译生态与自然生态的类似性和同构性为基础，以生态学的整体观为方法论，以华夏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智慧为支点，以译者与翻译生态环境的相互关系为研究对象，用生态翻译学的范式，研究各种翻译问

题。可以说，生态翻译学又是对翻译适应选择论本质的挖掘、拓展与提升。

翻译学是多学科交叉的综合性学科。系统论把系统看作由相互作用和相互依赖的若干组成部分结合起来而具有特定功能的有机整体。从系统论的角度看，不是所有与之相关的学科都是交叉学科。综合性学科是把几个知识领域中发现的一种抽象客体作为研究对象而形成的，这一抽象客体亦即相关交叉学科的共同切合点。翻译是符号之间传递信息的语言、文化、思维活动。语言学与翻译学的切合点是语言符号的语义和结构转换；文化学与翻译学的切合点在于异质文化在翻译过程中的制约与传递；而思维科学与翻译学的切合点在于翻译思维的形成及其规律。那么，生态学与翻译学交叉，它与翻译学的切合点又在哪里呢？

胡教授告诉我们：“生态翻译研究范式以生态整体主义为理念，以东方生态智慧为依归，以‘适应 / 选择’理论为基石，系统探讨翻译生态、文本生态和‘翻译群落’生态及其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致力于从生态视角对翻译生态整体和翻译理论本体进行综观和描述。”（见本书“前言”）可见，生态学与翻译学交叉点在生态环境与翻译语境。翻译语境（胡教授在本书中称之为“译境”）是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构筑起来的两种语言文化相关的主客观因素互动的总和，包括四个关键因素：译者、原作语境、译语语境、互动。生态翻译学要系统探讨的四大要素（翻译生态、文本生态和“翻译群落”生态及其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

用)正暗合翻译语境的四个因素。其意义在于,生态翻译学从生态理性的视角综观翻译,这就弥补了以往翻译研究在这方面理性工具不足的缺失。

生态翻译学是一个自成体系的翻译学说。它在生态整体主义指导下,隐喻人类普遍接受的“适者生存”、“优胜劣汰”的基本原理,不仅在上述交叉点上极显其学科的特点,而且还以中国古代哲学中的“天人合一”、“道法自然”、“以人为本”、“适中尚和”的经典智慧为依归,构建了整体的翻译生态体系,揭示了翻译生态理性,提出了生态翻译伦理;在此基础上,回答了翻译本体研究中关于“何为译”(what)——翻译是译者适应翻译生态环境而对文本进行移植的选择活动;“谁在译”(who)——“译者中心”、“译者责任”;“怎样译”(how)——“汰弱留强/求存择优”、“选择性适应/适应性选择”;“为何译”(why)——“译有所为”等翻译学的根本问题。同时,生态翻译学还从生态理性视角对翻译原理、翻译过程、翻译标准、翻译策略、翻译方法和其他翻译现象以及整体翻译生态体系等做出了新的综观和阐述。

生态翻译学是一种自足的独立的理论体系。它有一整套术语来描述其研究对象、目的、内容、方法、规律、定理的基本概念。一般来说,术语是某一特定理论区别于其他理论的重要标志之一;而术语的科学化、系统化既代表了某种理论的发展水平,也已成为保证翻译学科稳步发展的重要条件。生态翻译学拥有一套别具特色的术语系统,如“关联序链”、生态范式、生

态理性、翻译生态环境、翻译生态体系、生态翻译伦理、文本生态、文本移植、平衡和谐、多元共生、多维整合、译者责任、选择性适应与适应性选择、“三维”转换、译有所为、事后追惩、整合适应选择度、翻译适应选择理论、翻译生态平衡论等。以上的有些术语已经收入由我主编的《中国译学大辞典》，汇入译学总系统的大河。

本书将生态翻译学定位为一种翻译研究的“生态范式”，并指出（第七章）：由于生态学是“元”科学，生态取向是一种综合学科取向，生态学作为一种方法论支配着普遍的社会思维方式，既是一门对社会产生广泛影响的学科，也是一门对人类生存发展具有终极意义的学科；同时，由于生态视角的翻译研究是生态理性观照下的翻译研究，或者说是运用生态哲学进行的翻译研究（如整体平衡原理、共生共存法则、多样统一规律等），它是一种具有哲学意义上的和方法论意义上的翻译研究；而作为从生态视角综观翻译的普通理论，生态翻译学又是一个涉及“译学”、“译论”、“译本”的整合性研究，因此，生态翻译理论的普适性将会越来越明显地呈现出来。

一个系统理论的效能在于其研究领域的覆盖面和普遍性。生态翻译学既拥有坚实的哲学基础，又符合逻辑法则和自然机理。此论一出，研讨活动络绎不绝，响应者比比皆是。据统计，十年间以生态翻译学的基础理论为基本框架的硕士、博士论文达百余篇，以生态翻译学为标题或主题词的国内外学术期刊论文已有数百篇；国外学者也已有十余篇相关论文在国际生态翻

译学研讨会上宣读和发表。其中，2004年至2011年，经我编发在《上海翻译》上刊登的研究论文就有15篇之多。

其中，有阐述核心理念的，如：翻译适应选择论的哲学理据（胡庚申，2004（4））；生态翻译学：译学研究的“跨科际整合”（胡庚申，2009（2））；整体生态译论场发生机理图式论（朱桂成，2010（2））；翻译生态 vs. 自然生态：关联性、类似性、同构性（胡庚申，2010（4））；论翻译生态环境（方梦之，2011（1））。

有以生态翻译学的基本理念和方法来解读各种翻译现象的，包括译者的翻译思想、文学翻译的个案研究和各种应用翻译文本的翻译研究，如：张谷若与“适应”、“选择”（孙迎春，2009（4））；适应与选择：严复翻译思想探源（黄忠廉，2009（4））；严复译著《天演论》的生态翻译学解读（焦卫红，2009（4））；译者的选择性适应与适应性选择——评《牡丹亭》的三个英译本（蒋骁华，2009（4））；从翻译适应选择论看新闻报道中隐喻习语的翻译（刘艳芳，2009（4））；生态翻译学视角下的公示语翻译——以上海世博会主题标语为例（宋慧娟，2010（2））。

生态翻译学潜行十年，不断发展。其中也有不为人理解，甚或有不同观点者。这是新生事物在发展过程必然会遇到的，需要讨论和引导。《上海翻译》编辑部针对该理论的核心问题之一——翻译过程中的“译者中心”问题——组织了讨论，发表了文章，如：生态翻译学理论下译者真的是中心吗？——与胡

庚申教授商榷（冷育宏，2011（3））；生态翻译学核心理念考辨（王宏，2011（4））；关于“译者中心论”问题的回应（胡庚申，2011（4））。

此外，还有十年研究的综述，从中可以看出生态翻译学从无到有，拔地而起，逐年发展、进步、完善的历程，如：生态翻译学R&D报告：十年研究十大进展（思创·哈格斯，2011（4））；国际化进展与进一步研究——生态翻译学的新起点（思创·哈格斯，2013（4））等。

近年来，仅《上海翻译》编辑部受理这一主题的研究论文就已接踵而至，数量远远超过上述已发论文。其中绝大部分是对生态翻译学理论的应用性阐释，特别是从语言维、文化维、交际维三个技术层面分析译本的特点与得失，以此论证“多维度适应与适应性选择”，而运用生态系统的理性特征、从生态学的视角来探讨翻译理论的不多，也鲜见对生态翻译学的本体论、价值观、认识论和方法论做进一步阐述。从面上的研究状况来看，研究范畴的拓宽、研究方法的改进、研究论题的多样化等方面，仍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关于这一点，胡教授在本书中也都有相应的评述。

生态翻译学在新世纪之初应运而生，不断发展，方兴未艾；而于十余年之后的今天问世的《生态翻译学——建构与诠释》，无疑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标志着生态翻译学即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同时，又可视为一部生态翻译研究范式的宣言书。我认为，本书对生态翻译学的理论话语体系做了全景式的描述与

诠释，进一步完善了理论范畴的建构，拓展了方法论，开启了生态范式的翻译研究。它将不仅有助于人们全面了解生态翻译学的研究与发展，而且也有益于梳理和阐明理论视点并解惑释疑，同时还将有利于吸引更多的学者关注和参与生态翻译学研究与交流。作为研究生态翻译学的一个新标尺，本书也是继八年前《翻译适应选择论》出版之后、在生态翻译学领域和我国译学理论研究中的又一颗璀璨的明珠，必将为我国、乃至国际翻译学学科建设做出新的贡献。

是为序。

2013年4月21日
于上海市梅城寓所

序二

题记：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开发本土学术资源的一面旗帜

——《生态翻译学——建构与诠释》序

许 钧¹

老友胡庚申教授来电，嘱我为其即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大作《生态翻译学——建构与诠释》作序，我欣然接受了。原因有三：论年龄，胡教授比我长；论学术追求，他的坚韧不拔让我敬佩；论书稿内容，我很熟悉，多少年来，我一直关注胡教授在生态翻译研究领域所做的开拓性的工作。

在《生态翻译学——建构与诠释》（以下简称《构与释》）一书中，生态翻译学的定位是“一种从生态视角综观翻译的研究范式”。该生态翻译研究范式以生态整体主义为理念，以东方

1 本序作者许钧教授现为中国翻译协会常务副会长、南京大学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翻译事业特别贡献奖”获得者，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外国语言文学学科评议组组长。

生态智慧为依归，以“适应 / 选择”理论为基石，系统探究翻译生态、文本生态和“翻译群落”生态及其相互作用和相互关系，致力于从生态视角对翻译生态整体和翻译理论本体进行综观和描述。我认为，说该书构建了生态翻译学的理论话语体系，对生态翻译学做出了全景式的描述与诠释，一点也不为过。全书对生态翻译学的研究对象、理论基础、研究内容、核心理念、研究方法、翻译策略、实践应用、发展取向、启示意义等都有深入浅出的论证和阐述。生态翻译学将翻译活动视为一个由“译境 + 译本 + 译者”构成的翻译生态“共同体”，是一个复合翻译生态系统，是一个活的有机的生态整体。我初步归纳了一下，生态翻译学至少提出了“十论”，包括翻译生态的“平衡和谐”论；翻译文本的“文本移植”论；翻译主体的“译者责任”论；翻译行为的“适应选择”论；翻译方法的“多维转换”论；翻译过程的“汰弱留强”论；翻译标准的“多维整合”论；译品生命的“适者长存”论；译者追求的“译有所为”论；以及译学发展的“关联序链”论，等等。我认为这部专著的主题鲜明，内容丰富，综观系统，正可谓“由简入繁又简，简内尽是精华点”，引人入胜，催人思考。

关于生态翻译学的研究与发展，我想起了2011年在上海召开的“第二届国际生态翻译学研讨会”上，中国译协翻译理论与翻译教学委员会副主任杨平博士所作的“从生态翻译学看中国翻译理论研究”的大会发言。她在发言中讲到了三点：一是，生态翻译学的发生与发展，前后已经十年了，这是一个事实，是一个客观存在。不论其中有多少我们可以接受、或者有多少我

们仍有质疑，但事实上它已经存在了。既然是客观事实，既然是现实存在，这就说明它有存在的必要性和客观需要，我们就要以一种宽容的心态去关注它，也要以一种科学的态度去正视它。二是，生态翻译学肇始于中国，是中国学者开拓的新的研究领域，是一项自主创新、具有独立知识产权的学术研究。经过十余年的努力，生态翻译学从无形到有形、从“照着说”、“接着说”到“领着说”。这一点确实难能可贵，令人欣慰。三是，从学科发展的角度来看，生态翻译学毕竟时间不长，还处在初创阶段，不少议题还需要更深入地探讨，还需要不断地改进和完善。对于杨平博士的判断和见解，我是非常赞同的。

事实上，我本人对生态翻译学研究的关注，并非始于今天，而是十年以前。当2001年10月22日胡庚申教授在香港浸会大学做了相关生态翻译学研究演讲的第二天，就有人向我通报了他的博士论文研究，我的第一反应就是颇为“新奇”，颇有“创意”，因为这种探索是应当鼓励的。因此，当胡教授的专著2004年刚刚出版不到一个月，我就和刘云虹博士联名写了长达四五千字的书评，发表在《中国翻译》上。2010年初，“国际生态翻译学研究会”在中国澳门成立、并举办了“首届国际生态翻译学研讨会”，我本人因与其他安排的时间冲突而未能到会，但专门委托代表发言，以致贺意。总之，近年来生态翻译学研究的丰硕成果及其在国内外的扩散发展，表明当年我们并没有看错，同时也表明我们多年来的关注和支持是值得的。

长期以来，在国际学术界，我们中国学者话语权不多，原因

是，我们缺乏自主的、创新的、具有活力的学术话语系统。说老实话，“译介”和“转述”都不是我们最终的目的。中国应当拥有原创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并且能够“走出去”的学术话语系统。

生态翻译学基于（西方）生态整体主义的基本原则，又受惠于中国传统的生态智慧，是一项翻译学和生态学的跨学科研究。分析这句话，前面一小句涉及现代和西方，中间一小句涉及古代和中国，后面一小句涉及人文和科学，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生态翻译学是一种中西结合、古今结合、文理结合的产物。令人可喜可贺的是，这种“贯中西”、“融古今”、“汇文理”的生态翻译学研究是在中国的土地上成长的，是由中国翻译界学者创生的。

因此，通读《构与释》，很自然地涉及生态翻译学的创导者胡庚申教授。

胡教授十数年如一日，淡定执着，艰苦努力。这是一种学术的努力，这是一种时代的努力。对于生态翻译学的研究和发展而言，如果说，前十年多是胡庚申教授个人的努力；那么，我认为，从今往后，这种努力应当不能继续只是一个人的努力，而应当是我们大家的事，应当是一种大家的努力。我们帮助胡庚申教授，进一步完善生态翻译学，在某种意义上讲，或者在不同程度上讲，也或者在某个环节上讲，就是在帮我们自己，就是有利于中国翻译研究“走出去”。因为，在当今世界上，中国人拥有自己“原创”的东西是很不容易的；在人文社科领域尤其如此。但像我们这样的泱泱大国，有这么庞大的翻译队伍和翻译实务，

应该有自己的理论拿出来，与外国同行真正平等地对话；在宏观翻译理论方面应该有中国学者的声音，在世界译林有自己的一席之地。事实上，中国翻译界从事系统宏观翻译理论研究的学者不多，已有建树者更是为数甚少。现在，既然我们拥有了这样的“生长点”，或者说，既然我们拥有了这样的“拓展点”，我们应当怎么办呢？我认为，我们的翻译界、我们的学术界应当思考和重视这个问题。我想，我们应当提高到“责任感”、“使命感”的高度来认识这个问题。

从无到有地构建一个全新的翻译理论体系，遇到的困难和挑战是可想而知的。记得有一次会议期间我与胡教授谈到这个话题，他说，整个构建过程中的犹疑、困惑或受挫简直就是“家常便饭”，有些时段甚至就是“寝食难安”。这些年大都是在“夹住尾巴”做人，时时都有“如履薄冰”之感。他说，事情已经做过了，现在回想起来还真有点“后怕”。可以想象，大凡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大凡走了前人没有走过的路的人，我相信大都会有类似的感觉。从事范式特征的系统理论研究更是如此。

胡庚申教授能做到这一点，表明了他具有一种“开发本土学术资源”的定力和拓荒创新的功力。说实话，为了准备这篇小序，我还是做了点“功课”。我查阅了相关的文献资料，发现胡教授的这种弄潮、创新的学术定力和功力绝非偶然，绝非一日之功，而是厚积薄发、多年一贯，早在二十多年前，就已显现。

1990年，胡教授的“双外”交叉研究论文在《现代外语》

首篇发表，该刊为之专辟“涉外外语”栏目，并加“编者按”，明确提出了是否能“自成一体在国内蓬勃发展起来”的学科建设问题，并“希望和读者诸君共同努力，把涉外外语应用学科的研究认真开展起来”（见《现代外语》1990年第4期，第1页）。

1991年，胡教授的口译研究论文在《外语教学与研究》首篇发表，该刊罕有地加了长达近1200字的“编者的话”，指出作者“代表了眼睛向着国内语言活动这样一个选择”，“表现了一种值得支持的倾向”，具有“开发本土资源之功”，“这是最需要的”，“我们自当为他们的开发精神欢呼！”（见《外语教学与研究》1991年第1期，第1页）。

1999年，《外语研究》“主编按语”中写道：“当今外语界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我们能否在新世纪闯出自己的路子，能否提出自己有分量的理论，能否创建自己的学说、学派。我想，回答是肯定的。因为我们已经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形成了一支老中青相结合的学术队伍，一批优秀的中青年专家学者已脱颖而出。他们勇于探索、勇于开拓，而且已经取得了一些开创性的成果。……胡庚申教授是个有心人，这是‘务实、创新’的一个很好的例子”（见《外语研究》1999年第1期，第5-10页）。

2009年，胡教授的翻译研究论文在《上海翻译》首篇发表，该刊开辟“生态翻译学”专栏，在长达千余字的“编者按语”中开宗明义地指出，由中国学者胡庚申创导的“生态翻译学与新世纪齐步”，并呈散发的趋势（见《上海翻译》2009年